

革命的張力與限界

● 王龍飛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紅軍各部隊在江西于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告別中央蘇區，走上西去北上的長征之路。直接導致長征的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一言蔽之，就是所謂「左」傾錯誤，

這一看法已成「常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道炫的近著《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以下簡稱《中央蘇區的革命》，引用只註頁碼)，則為讀者呈現了一個明顯不同於「常識」的中央蘇區革命圖景。

一 第五次反「圍剿」的黨史定性與相關研究

對於反「圍剿」的戰略失敗，中共方面很快就展開了分析和檢討。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負責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的博古和李德(布勞恩[Otto Braun])被批判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並被剝奪軍事指揮權，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重新確立。這次會議上，博古在他的報告中強調「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導致反「圍剿」失敗，但會議認為這一看法「過份估計了客觀的困難」(《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載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677)。

直接導致長征的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是所謂「左」傾錯誤，這一看法已成「常識」。黃道炫的《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為讀者呈現了一個明顯不同於「常識」的中央蘇區革命圖景。

儘管作者將研究時限定為1933至1934年，但實際上本書是對中央蘇區的一個貫通性的研究，作者是以開始於1933年、結束於1934年的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為中心展開討論。

這個結論在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再次得到了確認。本次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968。）

這兩次會議都明確強調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在於自身的主觀失誤，犯的是「左」傾路線錯誤。中共中央的這個定性，決定了以後闡釋和論述這個問題的基調，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學界的相關研究就在這個既定框架中展開。最新官方版本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仍沿襲這一定調，認為「『左』傾錯誤的進一步發展，使得紅軍在反『圍剿』中只能繼續執行前一段的錯誤的戰略戰術，從而在蔣介石重新發動的進攻面前遭到更為嚴重的損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頁380）。

以上兩個重要文件和一個權威表述大體上可以解釋長期以來蘇區史研究的嚴重不足和基本觀點的高度一致。國外學者雖然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了對蘇區的研究，但並未產生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成果。相較於江西蘇區，他們似乎更樂意去探究延安。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學者開始在一定範圍內突破意識形態的束縛，開始對某些習以為常的命題發出質疑，走向對歷史實態的探究與分析。代表學者有楊奎松、黃道炫等，主要關注的問題包括革命

的社會生態、政權組織、革命動員、戰略戰術、共產國際（蘇聯）的作用等。產生於這個背景下的《中央蘇區的革命》一書，自然就有了諸多方面的開創性意義。

二 本書主要內容及立論

本書的研究對象為位於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於1931年11月在該區成立，1933年初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到這裏。儘管作者將研究時限定為1933至1934年，但實際上本書是對中央蘇區的一個貫通性的研究，而根據本書內容來看，作者是以開始於1933年、結束於1934年的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為中心展開討論。

本書前兩章是關於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背景描述和分析。其中第一章講的是贛南閩西地區成為蘇區前的基本社會情況。一方面，作者借助毛澤東的〈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來認識當時當地的土地佔有、中農問題、公田問題、宗族制度、農民負擔及生活狀態等方面的情況，基本立論是土地集中情況不突出，與革命沒有必然關聯，但普遍貧困是基礎性的原因，大量存在的公田是可資利用的活棋。另一方面，從時局和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在中央蘇區的生成過程中，恰逢國民黨內部蔣桂、蔣馮紛爭，南京無暇亦無力顧及遠在贛閩邊界的中共，這成為蘇區成長和發展的有利條件。

第二章講的是中共在蘇區所進行的革命活動，包括黨組織發展、

蘇區政權建設、教育文化宣傳、婦女解放、群眾動員及紅軍隊伍加強等幾個方面。在中共的主導下，中央蘇區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造，表現出空前的生機與活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蔚然可觀。不過，一些問題也開始暴露出來，譬如幹部腐敗、農民負擔沉重等。

第三、四章分別討論國民黨「圍剿」和中共反「圍剿」的準備情況。國民黨方面此時內外環境寬鬆（內部紛爭平息，北方日本稍安，還與英、美、德達成數項經濟合作協議），按總體戰的思路，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政策，遵循「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採取了步步為營的碉堡封鎖戰術，並為此專門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堪稱準備充分，全力以赴。中央蘇區雖事先已判明南京方面的意圖，但除了推行成效並不大的紅軍正規化建設以及進行相應的備戰預案之外，並未能有更多的應對之策。

第五、六章分別講述反「圍剿」戰爭中中央蘇區面臨的資源陷阱和政治困境。資源陷阱指的是隨着戰爭的進行，蘇區空間被不斷壓縮，而人力、物力又消耗極大，財政日益困難。其直接後果就是農民負擔加重，由此推行的查田運動存在較為突出的高定成份現象。社會政治困境隨之而來，肅反擴大化、工作風簡單粗暴、群眾大規模逃跑、「擴紅」困難、開小差嚴重、赤白對立尖銳，這些使本已困難的局勢更加嚴峻。

第七章分析國共雙方在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中的戰術情況。中央蘇區在李德的指揮和博古的配

合下，共產國際的影響得到極大發揮，但內部對於戰略選擇數度發生分歧。在1933年11月的「福建事變」（閩變）中，中共與閩方雖有合作，但因各種原因始終未能達成穩固的協定。隨着戰略選擇餘地日漸狹窄，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保衛與爭奪上亦屢屢失利，最後不得不進行戰略撤退和轉移。

基於以上有關本書主要內容的簡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作者對於中央蘇區革命的基本看法：「當年國共之間的對壘，並不完全在同一個數量級內進行，中共的發展，更多的是利用國民黨統治的內部衝突，當這個衝突趨於平穩、南京政府力量不斷上升時，中共受到的壓力將空前增大。」（頁477-78）作者進一步指出：「在一個叢林法則的世界中，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實力終究是進退成敗的關鍵。」（頁478）

這個論斷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在當時的條件下，即便中共沒有犯下所謂的「左」傾錯誤，也沒有出現重要的戰略失誤，一樣難免失敗；或者可以說，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共所犯的錯誤是不得不犯的，或者是不得已而為之，又或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所以，作者沒有將失敗的原因簡單地歸咎於中共自身的戰略失誤，也沒有主張國民黨的強大進攻單方面導致了中共的失敗，只是表明在眾多內外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歷史走向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樣的立論與前述中共的「主觀錯誤」定性存在着明顯的區別，是對中央蘇區革命失敗的新解釋，揭開了被遮蔽許久的歷史面相。這也是本書主要學術貢獻之所在。

作者沒有將反「圍剿」失敗的原因簡單地歸咎於中共的戰略失誤，也沒有主張國民黨的強大進攻單方面導致了中共的失敗，只是表明在眾多內外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歷史走向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是對中央蘇區革命失敗的新解釋。

三 「張力」與「限界」： 有關視角的討論

回到本書主標題的「張力與限界」，作者借用「張力」和「限界」，實際上要表達的是他對中央蘇區革命的總體性理解。關於這對看來令人費解的概念，作者有這樣的解釋：「我在使用『張力』與『限界』時是希望通過這個詞來表達我對革命的充分可能和可能的限界之中的界定。」（參見黃道炫：〈革命的張力與限界〉，燕山大講堂，第140期，<http://view.news.qq.com/zt2011/ysdjt140/index.htm>的視頻和文字。）根據作者的意思，大體上，我們可將「張力」理解為「紅色政權為甚麼能夠存在」，而「限界」則可被理解為「紅色政權為甚麼會遭遇重大挫折」。國共分裂後，中共於短時間內在資源稟賦平平的地區挺立起數十萬人的武裝力量，無疑是革命能動性的充分發揮，是革命「張力」的體現；而在國民黨重重圍困之下，人口和土地都極為有限的蘇區日益捉襟見肘，各種問題紛紛暴露，中共的執政和鬥爭能力都受到了嚴峻的考驗，最後不得不面對失敗，這顯然是革命能動性所不可突破的客觀制約，即所謂「限界」。

若以吹氣球來比喻，氣球不斷膨脹是「張力」的表現，而大到不能再大而爆裂則是「限界」之所至。不同的是，歷史往往不可能像吹氣球那樣有清晰的「限界」，它的「限界」只會在與「張力」的互動中相對地顯現出來。這裏之所以強調「張力」與「限界」只會在互動中相對顯現，意在警示將「限界」作為已知的、確定

的結果去反推「張力」的錯誤做法。如果那樣，「張力」所代表的「可能性」也就在事實上成了「必然性」，對歷史的探究也就成了一個由結果向原因的反向推導過程，歷史的豐富可能性必然遭到遮蔽和有所疏漏。

再回到中央蘇區的革命，若以失敗的結果反向求證，自然會有意無意地格外關注國民黨方面的優勢和中共方面的劣勢，並將這些因素不成比例地放大。譬如特別強調中共武裝槍械落後，這雖是事實，但問題是國民黨方面的裝備也難說是很先進。再說，在地形複雜、交通不便、作戰分散等諸多因素制約下，裝備的差距在戰場上會有多大程度的體現呢？所以一切都應放在當時當地的條件下去衡量，背景被還原得愈充分，衡量的座標體系也就會愈精準，所得結論自然更具說服力。

就本書而言，儘管作者着重在談「限界」，但對於「張力」部分亦用力甚重。關於這點，作者曾解釋說：

我覺得每一段歷史都是混亂的，我們每一個語言，每一個試圖用語言把歷史表達出來的努力，都難免會用語言把很多不希望出現的混亂消滅掉，但這種消滅其實本身就已經在對歷史做了閹割。我用張力，是否能夠盡可能的把這種閹割減少。所以我是試圖去豐富可能，試圖去追問更多的可能性，試圖面對更多的可能性……（黃道炫：〈革命的張力與限界〉，燕山大講堂，第140期。）

作者借用「張力」和「限界」來表達他對中央蘇區革命的總體性理解。他洞察到即便處於興盛時期，中央蘇區一樣存在許多問題，也揭示出中共與閩方關係的微妙，還注意到蔣介石在最後關頭的不合常情的決策，並給出可信的解讀。

正是因為這種對歷史的審慎謙卑的態度，作者能洞察到即便處於興盛時期，中央蘇區一樣存在許多問題，也能揭示出中共與閩方關係的微妙之處，還能注意到蔣介石在最後關頭的不合常情的決策給共軍留下一條向西的通道，並給出可信的解讀。雖然這也許不能在根本上改變歷史的宏觀走向，但會產生局部影響，也會對我們理解事件的結果大有裨益。

為了盡可能豐富這段歷史的可能性，本書在史料運用上花了不少功夫。我們看到在很多地方，作者使用了幾個方面的材料以期互參互證，盡可能達到持論客觀中立。譬如，在中央蘇區社會狀況上，用毛澤東的調查和陳誠的分析相互印證；還譬如，在引用李德的回憶時（李德的回憶錄《中國紀事：1932-1939》一般被認為有諸多不確之處），佐之以周恩來在當時報章上的言論。作者也努力地挖掘多重史料以期揭示更複雜的面相。譬如，在處理閩變問題上，相較於電文、戰報，蔣介石日記就提供了很不一樣的資訊。這也是為甚麼雖然本書所用史料並不新鮮，也難說罕見，但挖掘出來的問題及其意義卻表現出較多新意且令人信服。運用多重證據實為歷史研究之必要，而對於中共黨史及相關研究而言尤為如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有頗多可資借鑒之處。

對於中共來說，多作自我檢討，從自身找問題，大大有助於增強革命能力。但對於後世覽史者而言，既看到「張力」也看到「限界」，顯然有助於更為持平公允地去理解歷史。或許這就是本書除了觀點之外，給我們的最有益的啟示。

四 對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啟示

以地域論，中共革命歷程可以概略地分為上海時期、江西時期、延安時期等幾個階段。如接力賽最後一棒受到更多關注一樣，海內外關於延安時期的研究明顯多於前二者。儘管地域在換，革命環境和鬥爭策略也在變，但整個中共革命歷程還是表現出嚴密的、深刻的前後關聯性。換言之，對於理解和把握中共革命來說，每一個環節和階段都不可或缺。

然而，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往往將延安時期作為一個全新的開始，以至於「延安道路」作為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被獨立出來並加以強調。事實上，正如本書所言：

作為中共首次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蘇維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裝革命思想和邏輯基礎……中共革命的幾個重要原則諸如武裝鬥爭、群眾路線、土地革命、社會再造等，在這一時期已經牢固確立，由蘇維埃革命開始，中共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革命建國的道路。（頁2）

作者顯然無意於判定哪個時期的歷史貢獻更大，只是在引導我們去關注歷史內在的關聯。對江西時期的革命進行剖析，並對比之後的革命實際，很容易發現中共的成長和成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諸多重要原則也是逐步積澱成形的。本書間接提示讀者，對於歷史研究而言，揭示和展現這種漸變顯然是十分必要的，而根據學術研究的現狀，這是大有可為的。

對於中共來說，多作自我檢討，有助於增強革命能力。但對於後世覽史者而言，既看到「張力」也看到「限界」，顯然有助於更為持平公允地去理解歷史。這就是本書除了觀點之外給我們的最有益的啟示。